

新左派对卢卡奇思想的利用与误用^{*}

[匈] 格奥尔格·图利 / 文 檀健哲 / 译

[内容提要] 本文以新左派思想家恩岑斯伯格对卢卡奇的解读与批判为线索，呈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卢卡奇的思想对新左派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匈牙利的传播与接受。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批判，卢卡奇再次得到重视。但在德国新左派思想家恩岑斯伯格看来，卢卡奇的思想仍然具有“旧左派”的特征。在研究传媒的文章中，他认为卢卡奇忽视了新出现的大众传媒的文化意义，无法把握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该文章在巧合下被翻译为匈牙利文。尽管该文最终没能在社会主义匈牙利出版，但其以“地下出版”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匈牙利文学研究者科佩齐从正统立场出发，认为恩岑斯伯格的文章重复了青年卢卡奇所犯下的过度的革命主观性的错误。科佩齐对卢卡奇和恩岑斯伯格的定位，与恩岑斯伯格对自己和卢卡奇的定位产生了错位与偏差，而这种错位与偏差反映了冷战期间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阵营思想交流的复杂性。

[关键词] 卢卡奇 新左派 媒体 布达佩斯学派

很少有人会否认，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著作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左派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他在 1923 年出版的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这一运动乃至整个时代的根本性文本（Ur-text）之一。相较而言，人们对他在 1919 年发表的《旧文化与新文化》一文知之较少。然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左派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这篇文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对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主义匈牙利对新左派思想的接受产生过有趣而复杂的影响。在下文中，笔者将集中讨论新左派对卢卡奇的最初接受和理解，重点聚焦于西德思想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影响。笔者将论证，恩岑斯伯格对卢卡奇的解读推动了冷战时期匈牙利对西方新左派思想在（半）官方层面的接受。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卢卡奇思想的利用（乃至误用）也——尽管是以一种微妙的、几乎不可能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方

^{*} 本文译自：György Túry: “The New Left’s Use and Abuse of György Lukács’s Thought”, András Kiséry, Zsolt Komáromy and Zsuzsanna Varga(eds.), *Worlds of Hungarian Writing: National Literature as Intercultural Exchange*, Madison and Teaneck: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pp. 143–156。

式——促进了“地下出版”(samizdat)的功能、本质与实践的初步理论化^①。

一、冷战期间的交流

在匈牙利相对自由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与执政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关系最密切的出版社^②提出了一个出书计划,旨在出版一本向公众介绍当代西欧和北美的新左派思想的选集。有人联系了作家、翻译家和反对派知识分子格奥尔格·达洛斯(György Dalos),请他为该计划撰写德语材料。达洛斯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开始着手文本的选择和翻译工作。

在工作中,达洛斯借助了自己先前的一些灵感。1970 年 5 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次国际诗人会议上,他遇到了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在那次会议上,恩岑斯伯格将他的最新一期的刊物《课程用书》(*Kursbuch*)交给了这位年轻的匈牙利诗人,达洛斯深深被这本期刊所打动,成了它的忠实读者。在考虑选集所涉及的可能文本时,他回想起了该期刊编辑恩岑斯伯格本人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媒体理论的构成要素》的文章是激进的新左派媒体理论的典范,同时也对卢卡奇提出了批评^③。

达洛斯的故事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人员、思想和文本交流的一个实例,也是“铁幕”之存在缝隙的一个证据:“铁幕”并不像传统冷战研究促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条密不透风的分界线^④。现在这一点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上述事件也说明,在这种交流中,事情往往以令人称奇而充满机缘的方式发生。默默无闻的年轻匈牙利诗人、作家和反体制知识分子格奥尔格·达洛斯^⑤有机会见到西德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恩岑斯伯格,就在两年前,达洛斯因参与“极左”学生组织而被判缓刑并丢掉了工作,并被禁止出版和旅行。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干预下,达洛斯最终被释放了。令人惊讶的是,恩岑斯伯格可以自由发放《课程用书》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刊物的副本,而它恰位于“1968 年学生运动的必读书目”^⑥之列。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就在

① 对这一主张的支持,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关联要比纯文本联系明显得多。关于后者,我们必须研究一下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匈牙利与(大众)媒体有关的“地下出版”(samizdat)著作。至于前者,只需回顾这样一个事实: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委托翻译恩岑斯伯格《媒体理论的构成要素》一文的机构(大众传媒研究中心)是一个为许多后来成为民主反对派重要人物的知识分子提供庇护的工作场所。

② 即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科苏斯出版社(Kossuth Publishing House)。

③ 其德文原标题为“Baukasten zu einer Theorie der Medien”,在 1970 年 3 月的《课程用书》第 20 期上首次刊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1929—2022),德国作家、诗人,曾获得毕希纳奖,是德国文学团体四七社(Gruppe 47)的主要成员之一。1965 年,恩岑斯伯格与卡尔·马库斯·米歇尔(Karl Markus Michel)一起创办了《课程用书》(*Kursbuch*)刊物,其在 1968 年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恩岑斯伯格以此在 1968 年时期的学生运动中成为颇具影响的作家之一。——译者注

④ 详情可参见 Autio-Sarasmo, Sari and Katalin Miklossy(eds.), *Reassessing Cold War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⑤ 1970 年时达洛斯 27 岁。

⑥ 参见 2008 年 6 月 12 日《法兰克福总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尤尔根·高贝(Jürgen Kaube)的“讣告”,引自维多利亚·哈姆斯的《生活在中欧》(Living Mitteleuropa),第 675 页。在描述匈牙利与德国知识交流的某些特点时,笔者参考了这篇文章。参见 Victoria Harms, “Living Mitteleuropa in the 1980s: A Network of Hungarian and West German Intellectuals.”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 Vol. 19, 2012, pp. 669–92。

这一切发生后不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版社向这位匈牙利诗人提供工作，并委托他挑选和翻译新左派文本。

达洛斯、卢卡奇和他们圈子里的其他成员还发生了其他相关事件，这些事件进一步证明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匈牙利（反对派）知识界及其国际根基的复杂历史。卢卡奇去世前不到六个月，他在《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上发表了一封信，这首次引起了西方对“布达佩斯学派”（由卢卡奇的学生及其追随者组成）作品的关注。^① 卢卡奇于 1971 年夏天去世，仅仅几年时间，布达佩斯学派的几乎所有成员就因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匈牙利政治的保守转向而被迫流亡^②。布达佩斯学派的被迫流亡并不是这一转变的唯一后果。例如，《计件工资》（Darabbér，又译《工人国家中的工人：匈牙利的计件工资》）一书的手稿被当局没收，这本书的作者，达洛斯的朋友、68 年一代米克洛什·哈拉兹梯（Miklós Haraszti）因此受审。^③ 该书于 1975 年首次以德语出版，1977 年以英语出版，1980 年以法语出版，后来又以其他十几种语言出版，直到 1989 年才在匈牙利首次合法出版。^④ 其最初的匈牙利语版本只能作为地下出版物阅读。该书的德文版由 197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作序，而安排德文版出版相关事宜的人正是恩岑斯伯格。^⑤

二、作为卢卡奇读者的恩岑斯伯格

恩岑斯伯格的《媒体理论的构成要素》一文的写作说明了一个事实：跨越铁幕两边的思想交流与个人交往具有同样的复杂性。为了追溯这篇文章对跨文化知识交流的贡献，我们必须首先讨论它的一些论点。这篇文章的核心在第 15 节：“媒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空白范畴。”恩岑斯伯格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批判了卢卡奇（称其为“反动的、回望式的怀旧思想家”^⑥）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通过对卢卡奇和麦克卢汉的批判，他描绘出两种可能的未来场景：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文章的这一部分提到了 50 年来马克思主义媒体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家（阿多诺、本雅明、布莱希特、霍克海默），但这部分内容只占了一段。颇为古怪的是，尽管卢卡奇从未真正涉及媒体问题本身，恩岑斯伯格还是决定更详细地讨论卢卡奇。恩岑斯伯格所关注的是卢卡奇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之一——《旧文化和新文化》

① György Lukács, “Lette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February 15, 1971.

② 卢卡奇的流亡学生包括阿格尼丝·赫勒（Ágnes Heller）、格奥尔格·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和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

③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哈拉兹梯就成为匈牙利民主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和地下出版界的领军人物。1981 年至 1989 年共产主义垮台这一段时间内，他任地下反对派旗舰刊物《发声者》（Beszélő）的主编。东欧剧变后，哈拉兹梯成为匈牙利议员，并于 2004 年至 2010 年间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驻维也纳媒体自由代表。

④ 该书的一位当代西方评论家称赞该书“具体描述了匈牙利工厂中的社会关系”，并声称“人们可以对这个[即匈牙利]社会的性质和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工作关系得出重要结论。”参见：Seymour Faber, “Review of Miklós Haraszti: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9, No. 2, 1980, p. 310.

⑤ 20 世纪 70 年代，恩岑斯伯格还在《课程用书》上发表了达洛斯的一些早期诗歌。

⑥ 参见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 *New Left Review*, No. 64, 1970, pp. 13–36.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New Culture*)^①。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分析了资产阶级旧文化的特征，并将其与共产主义新文化进行了对比。恩岑斯伯格认为，卢卡奇对新文化的阐释实际上误解甚至忽视了这一主题的关键特征。旧文化固然是在解构自身（同时也连同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解构）^②，但在恩岑斯伯格看来，卢卡奇对新文化的描述也陷入了“虚”与“空”之中——尽管这是卢卡奇无意所为，但也恰恰正是问题所在：卢卡奇没有认识到当时新兴的新视觉媒体的潜力。而正是这些“真空”引发了麦克卢汉倡导的那些思想。^③恩岑斯伯格集中讨论了卢卡奇文本中的如下段落。

“只有当文化产品本身是有价值的，只有当每个产品的创造从其创造者的角度看是一个单一的、有限的过程时，它才具有真正的文化价值。此外，它还必须是一个以人类潜能和创造者能力为条件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艺术作品，作品完全诞生于艺术家的劳动，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由艺术家的个人素质决定的。另一方面，在高度发达的机械工业中，产品与创作者之间的任何联系都被取消了。人服务于机器，他适应了机器。生产变得完全独立于人类潜能，也独立于工人的能力。”^④

恩岑斯伯格还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观点：“这样沉重笨拙的愚言充分表露了庸俗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丝毫不知考量科技的任何发展，一旦面对新科技的挑衅，便深恐穷途末路已近。”^⑤《旧文化与新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洞见：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因自身系统内的矛盾而自我毁灭。卢卡奇关注的是这种预想中自我毁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经济和文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文化毁灭这一问题，是卢卡奇终其一生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⑥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方面的研究都必然会

① 卢卡奇谈论的是艺术而非媒体。然而，在恩岑斯伯格看来，它们似乎已经合二为一（尽管恩岑斯伯格没有具体说明这是何时发生的）：“过去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从严格的黑格尔意义上讲，现在已经被媒体辩证地超越了。”参见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31。卢卡奇的这篇文章于 1919 年首次以匈牙利文发表，1920 年以德文发表。

② “在经济和政治崩溃之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本身已经崩溃了。”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22。

③ 麦克卢汉也受到了恩岑斯伯格的批评，他被恩岑斯伯格称为“充满挑衅性、愚蠢的、口技表演艺术家”。参见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29。

④ Lukács,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New Culture”, *Telos*, Vol. 3, No. 5, 1970, p. 28。

⑤ 读者可以在卢卡奇的身上找到“技术恐惧症”的踪迹。卢卡奇在 1913 年关于电影的诗学文章中，以及后来在卢卡奇的《美学》中关于电影的一章中，以及 1968 年 5 月关于“匈牙利新电影”的一次晚期访谈中都表现出了这种特点。关于前两者的学术评论，参见 Kelecsényi, “Lukács György esztétikája” 和 Lukács, “A filmnek a mai magyar kultúrában”，见 György Lukács, “A filmnek a mai magyar kultúrában uttoró szerepe van” [Interview with György Lukács conducted by Yvette Biro and Szilard Ujhelyi], *Filmkultura*, Vol. 4, No. 3, 1968, pp. 22–36（恩岑斯伯格引用的是本雅明谈论摄影技术的名文《摄影小史》（*Kleine Geschichte der Photographie*），中译文参见：本雅明：《摄影小史》，许绮玲，林志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8 页。——译者注）参见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28。

⑥ 更多内容参见 György Márkus, “Life and the Soul: 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Culture, Science, Society: The Constitution of Cultural Modernity*, Leiden: Brill, 2011, pp. 521–551。

导向对整个体系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文化从这一体系的所有潜在方面中挑了出来^①，其文章也以此作为开端。

“社会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这意味着，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某一阶段的发展都会对其他所有领域产生影响。通过社会发展的这种统一性和一致性，我们可以从一种或另一种社会现象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同一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脱离其他社会现象来谈论文化，因为当我们正确地把握任何时期的文化时，我们也就把握了这一时期整个发展的根基，正如我们从分析经济关系开始一样。”^②

卢卡奇阐述了自我毁灭过程的若干组成部分，并认为，资产阶级文化已经崩溃。在这种崩溃之后，只会出现同样由自身引起的经济崩溃。“文化”，顾名思义，不可能存在于“金融资本主义”之中。这是由于如下几个互相关联的因素：首先，它缺乏社会先决条件：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逻辑，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文化的阶级已不复存在。在资本主义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社会阶级都要被迫“为生产服务”^③，因此不再具备生产文化的能力。个人、各群体和各社会阶级都成了“生产的奴隶”^④。其次，既然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那么文化产品（即使在之前的时代也曾有其他意义）也难以幸免地成了商品。第三，由于资本主义的分工，产品与生产者之间以及产品本身之间原先存在的有机和谐的、连续的关系也不复存在。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曾帮助资产阶级掌权，其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时还具有进步意义。但现在，每个社会成员却难以再获得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被纳入了资本逻辑。文章的其余部分详细阐述了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的特征，而恩岑斯伯格只对其中的一个特征进行了论述。他特别强调了卢卡奇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有机性的坚持，无论是从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维度（商品化和物化的终结），还是从文化产品本身的维度（无机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文化的终结）来看，都是如此。

恩岑斯伯格对卢卡奇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不无道理：卢卡奇显然对那个神话般的前资本主义时代有所怀念，而那个时代的特征即是“有机文化”。然而，至少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卢卡

① 早在 1962 年，恩岑斯伯格就在《心灵的工业化》一文中间接地批评了卢卡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产业一词在欧洲成为常用语，但这一术语同样不恰当。与其说它反映了现象本身的范围，不如说它反映了那些试图对其进行分析的人的社会地位：大学教授和学术作家，这些人被权贵阶层贬斥为‘文化生活’的保存者，因此他们只能接受文化批评家这个不幸的名称。换句话说，他们被证明是无害的；他们被要求（*supposed to*）从文化（*Kultur*）的角度——而不是权力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参见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ind”, Michael Roloff (eds.),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O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4, p. 4. 引文斜体为本文作者添加。

② Lukács,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New Culture,” p. 21.

③ Lukács,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New Culture,” p. 21.

④ Lukács,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New Culture,” p. 22.

奇所坚持的文化就一直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攻击。^① 尽管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这一术语及其含义已饱受争议,但恩岑斯伯格仍聚焦于这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观点,无论是对 21 世纪而言,还是从其最初出版时来看,都略显过时还含有一定误导性。

恩岑斯伯格自己的论点如下:一种新媒体近期以电子媒体的形式出现,如同现代社会生活中其他重大的新发展一样,需要对其予以批判性的关注^②。它应当从政治的角度加以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最合适的理论工具。^③ 因此,应当考察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性文献,并关注那些反映马克思主义对特定现象之理解的现实政治运动。在这一点上,有两个选择:如果当下的学术研究并不完整或难以令人满意,那么就需要对其进行修改或补充;如果在相同的问题上存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那么就需要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因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必然会错失关键要点。恩岑斯伯格的文章遵循了第一种选择:借助批判卢卡奇,他以此批判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恩岑斯伯格看来,卢卡奇最大的问题在于他错误理解了新文化的特征及其潜力。笔者认为恩岑斯伯格的观点在推论层面有些问题,因为他隐含地将“文化”等同于“媒体”,这与卢卡奇对这一术语的用法不同。卢卡奇的文章发表于 1919 年,当时虽然已经有了电影和广播,但电子媒体的广泛应用仍是不可想象的。卢卡奇并没有谈及(电子)媒体,虽然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看法可以应用于媒体之上,但我们可能需要比恩岑斯伯格更加谨慎的方式展开研究。^④

事实上,恩岑斯伯格实际与卢卡奇共享一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仅如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许多观点也切中了他所批判嘲弄的、属于卢卡奇看法。恩岑斯伯格写道:“垄断资本主义比其他生产部门更快、更广泛地发展了那些能够塑造意识(consciousness-shaping)的产业,但同时,它也对这些产业施加了束缚。”^⑤ 这一辩证法预计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毁灭——而这又是卢卡奇的观点。恩岑斯伯格认为,不应坐等这种毁灭发生,而应介入这一过程。这里他明确指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介入。替代方案既不能在“改良”资本主义中找到,也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实践中寻找:这种制度只有“通过释放新生产力中固有的解放潜

① 有关这一主题的二手研究浩如烟海。关于第一部分的观点,参见 Michael Denning, “The Socioanalysis of Culture”,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London: Verso, 2004, p. 75-90; 关于第二部分的观点,参见 Szeman, Imre.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or, the Humanities in Ruins”,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Vol.3, No. 2, 2003, p. 91-115。

② 在《心灵的工业化》中,恩岑斯伯格更具体地阐述了大众传媒的诞生(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出现和广泛应用,电子媒体成为大众传媒的一部分):“塑造心灵的工业实际上是近百年来的产物”。参见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ind”, Michael Roloff (eds.),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O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4, p. 4。

③ 恩岑斯伯格的文章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众多原因中,这一点尤为重要:恩岑斯伯格试图从政治角度解读一种新的、非常重要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现象,即大众传媒和大众传播的出现。为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做到这一点,与青年卢卡奇思想的邂逅是恩岑斯伯格无法回避的。

④ 按照这种逻辑,恩岑斯伯格声称,由于缺乏任何潜在的政治上活跃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卢卡奇的疏忽造成了一个必然会引发其他阐释的“真空”。其中最明显具有误导性的、最为自欺欺人的就是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的学说具有误导性,十分危险,而且应该避免。因为在恩岑斯伯格看来,它缺乏任何政治价值。

⑤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14.

力”才能克服，“而资本主义必然如同苏联修正主义一样会坚决破坏这种潜力，因为它会危及两种制度的统治”^①。恩岑斯伯格呼吁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力量抛弃卢卡奇所代表的旧左派，抛弃所有那些过时而无用的策略和特点，充分利用新电子媒体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动员群众方面（见《媒体理论的构成要素》第 2 节）。这两种体制都不希望人们能够在没有某种中央控制的情况下相互交流，更遑论让人产生可以轻易被动员的感觉。至于新左派和旧左派之间的基本差异，恩岑斯伯格提出了一些激进的看法。他指责当代左派（68 年一代）培养出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态度和价值观。因此，他认为，左派无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掌握新的电子媒体的控制权。只有获得控制权，左派才有可能将其用于实现真正社会主义变革的政治目的^②。这一段值得全部引用：

“一系列文化因素强化了这种抵制和恐惧的心态，而这些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如今左翼运动参与者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为此提供解释：他们拥有资产阶级背景。人们常常觉得，似乎正是因为媒体具有进步的潜力，所以它才被视为一种巨大的威胁力量；因为它第一次向资产阶级文化提出了基本挑战，从而也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权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比这个社会群体所能表现出的任何自我怀疑都要激进得多。在新左派反对媒体的过程中，旧资产阶级的恐惧——如对“大众”的恐惧——似乎正在重新浮现，同时出现的还有对前工业时代的向往，只不过这种向往被披上了进步的外衣。”^③

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卢卡奇是恩岑斯伯格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他认为，卢卡奇是“反动的、回望式的怀旧思想家”之一，这些人看不到新媒体的潜力。他们由于缺乏对这些内容的了解，最终导致了非左派或非政治的团体的胜利（例如，那些将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立场神化的反文化团体）。

迈克尔·丹宁（Michael Denning）在其重要论文《文化的社会分析》中描绘了新左派的社会谱系（sociogenesis），恩岑斯伯格是其中在列的五十位新左派思想家之一。丹宁声称，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寻找如下问题的答案：“如何在阶级缺失的情况下，发明一种马克思主义？”^④这一问题在 1968 年后变得更加紧迫，迫使这些思想家得出一个基本问题：谁应该且能够成为变革的主体（agent）？

① 抛开其他因素，正是因为恩岑斯伯格提出了一些既不符合资本主义，也不符合（现有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才使得恩岑斯伯格提的作品无法在匈牙利得到出版和接受。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14.

② 恩岑斯伯格提甚至用讽刺的口吻说，“他们显然还在固守《火星报》的模式（Iskra model）”。见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19.

③ Enzensberger, “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p. 18.

④ Michael Denning, “The Socioanalysis of Culture”,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London: Verso, 2004, p. 84. 另参见 Alasdair King,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Writing, Media, Democracy*. Oxford: Peter Lang, 2007, p. 165. 这篇文章认为恩岑斯伯格“将[缺乏阶级基础]的原因归结于‘意识塑造之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抹杀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意识”。

在丹宁的新左派思想家名单上，最年长的罗兰·巴特在1972年发表了一些颇为非正统的言论：“本世纪的任务之一在于，了解小资产阶级如何才能成为进步阶级。我相信，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历史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悬而未决……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没有一个群体能够免受小资产阶级文化的普遍传染。”^① 马克思、卢卡奇（恩岑斯伯格引用的那篇卢卡奇文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恩岑斯伯格对其进行了批判）都论述过这一问题，恩岑斯伯格本人也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反思。

无论是卢卡奇（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恩岑斯伯格（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都认为，小资产阶级不是承担无产阶级角色的候选者。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最为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恩岑斯伯格将卢卡奇作为负面参考的“利用”计划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大的误导性。卢卡奇的那篇文章并不是关于媒体的，而且卢卡奇在其中的观察很难应用于媒体之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大的概念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20世纪文化观念的变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的关系。正如丹宁所言，“到1950年时，再去构想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同从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和恩斯特·费舍尔（Ernst Fischer）所思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一样——这在当时是颇为古怪的想法”^②。实际上卢卡奇的《旧文化与新文化》一文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文化理论最杰出的贡献之一。而文化革命理论则是西方新左派思想的核心，这一点毋庸置疑（新左派思想家引用了卢卡奇、毛泽东、切·格瓦拉等人的著作，并将他们的观点互相融合）。

三、匈牙利未竟的故事：一个奇特的接受史案例

达洛斯翻译了恩岑斯伯格的文章，并将其纳入了他提议的、涵盖当时德语新左派思想的材料中。其他类似的德语和英语文章（包含激进派、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同在翻译后收录到这本预计出版的选集中。编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风险因素”——许多文本中的思想过于左倾，也过于激进。于是，他们尝试了一种之前曾多次奏效的方法：试图以出版总署的署长（director of the General Directorate of Publishers）——贝拉·科佩齐（Béla Köpeczi）——这位最可靠、最忠诚的同志所撰写的“适当”前言来抵消许多收录于其中的文章的激进主义。然而这次这一招没有奏效。尽管编辑们费尽心机精心策划，但这本选集还是没有获得批准。许多文章在政治上难以得到接纳，其中恩岑斯伯格的文章最为突出。这篇文章提到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遭受的入侵，并批评了苏联。而最重要，也最难以令人接受的是，它对卢卡奇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卢卡奇于1971年6月4日去世以后，他的思想在他的祖国匈牙利几乎

^① Roland Barthes, “The Fatality of Culture, the Limits of Counterculture”,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terviews 1962–1980*, Linda Coverdale(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5, pp. 154–155.

^② Michael Denning, “The Socioanalysis of Culture”,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ree Worlds*, London: Verso, 2004, p. 79.

无人敢碰。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这部译著复杂而怪诞的余生中发生了两件并不相干的事情。1974 年，贝拉·科佩齐出版了一本名为《“新左派”的意识形态》(Az “új baloldali” ideológiája) 的专著。令所有最初参与其中的人大吃一惊的是，该书中包含了恩岑斯伯格文章中的一些段落，以及科佩齐对文章的评论，但并未涉及批判卢卡奇思想这一仍然在政治上颇为敏感的问题。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位在布达佩斯大众传媒研究中心 (Tömegkommunikációs Kutatóközpont, 英文为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 工作的大众传播和媒体学者安德里亚斯·塞科福 (András Székfü) 再次提议发表恩岑斯伯格的这篇文章。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大众传媒研究中心的历史和活动。^①1969 年 7 月 1 日，随着“论语言与传播”会议的召开，大众传媒研究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正式成立。就机构设置而言，它是匈牙利广播电视公司 (Hungar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pany) 的一部分，自 1963 年以来，该公司中一个规模较小的单位致力于对匈牙利大众传媒的社会接收情况进行学术分析^②。就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以及其机构结构而言，它是共产主义国家集团 (Soviet bloc) 中第一个此类机构^③。该中心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包括对媒体接受、群体的品味偏好、刻板印象、偏见、公众舆论、社会文化变迁、工人业余活动、视觉文化等，还包括 1986 年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媒体接受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在所有研究中都尝试使用跨学科方法和最先进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当时都非常具有革命性。该中心有自己的期刊 (Jel-Kép)，该研究所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被允许邀请国际学者。^④与该中心有关的书籍出版物超过 300 种，平均每年超过 15 卷。^⑤

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塞科福试图通过自己所属的机构 (大众传媒研究中心) 出版翻译的草稿，并将其编入一套非公开发行的丛书中^⑥。他尽可能小心谨慎，并选择事先自行进行审查，

① 笔者的总结来源于 Tamas Terestyéni, “Volt egyszer egy Tömegkommunikációs Kutatóközpont...”,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of Hungarian Association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Budapest Oct 1, 2009. Accessed July 6, 2014. www.communication.hu/mktt/hirek/konferenciak/2009/tk40/nyitoloalas.htm.

② 1985 年，该中心决定独立出来，并于 1988 年更名为“匈牙利公共意见研究中心” (Hungar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自由选举的新政府于 1991 年废除了该中心。1991 年 12 月 15 日，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主要聘用原来旧机构的研究人员，但这次它成为匈牙利科学院著名的研究中心网络的一部分。新名称是 (现在仍然是)：匈牙利科学院和罗兰大学传媒理论研究中心 (Communication Theor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③ 有关该机构 (以及共产主义国家集团中的类似机构)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ndras Székfü, “An Untitled Overview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s in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Andras Székfü (eds.), *Public Opin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Working Conference, Budapest, 1971*, Budapest: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 Hungar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1972, pp. 171–213.

④ 包括美国的乔治·格布纳 (George Gerbner) 和珀西·塔南鲍姆 (Percy Tannenbaum)、芬兰的卡尔·诺德斯特伦 (Kaarle Nordenstreng)、英国的詹姆斯·哈罗兰 (James Halloran)、苏联的鲍里斯·菲尔索夫 (Boris Firsov) 和贾多夫 (V. A. Jadov)。见 Tamas Terestyéni, “Volt egyszer egy Tömegkommunikációs Kutatóközpont...”,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of Hungarian Association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Budapest Oct 1, 2009. Accessed July 6, 2014. www.communication.hu/mktt/hirek/konferenciak/2009/tk40/nyitoloalas.htm.

⑤ 正是该中心首次用匈牙利文出版了一些媒体和传播研究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的《论电视》。

⑥ 该中心出版了几套丛书，但并非所有丛书都面向公众。其中一些只供“内参”，即供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研究人员和高级别官员参阅。

以此希望最终的出版不会受阻。他删除了文章中对苏联和卢卡奇的公开批评，还删去了一些段落让文章更加简短。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即便经过自我审查并列入不向公众开放的丛书，这种出版形式也被认为是危险的。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让它作为地下出版物（samizdat）在学生中传播。^①

恩岑斯伯格文章的匈牙利语翻译版本以手稿形式保留了30多年。2008年，塞克福出版了一本关于媒体和传播相关问题的论文集^②，这些论文是他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写就的，但由于政治原因，它们在当时未能面世。恩岑斯伯格文章的匈牙利语版本首次以附录的形式完整收录，并附有塞克福和译者达洛斯的回忆录。^③

贝拉·科佩齐的书^④记载了当时匈牙利对西方新左派思想的半官方接受——包括对卢卡奇的利用和误用。这本书明确使用了原计划为新左派选集而参考和翻译的那些文本^⑤。科佩齐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且他在共产主义匈牙利正式和非正式的等级制度中都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他可以提议出版这样一本书。这一胎死腹中的选集与科佩齐关于西方新左派思想的专著之间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收录了新左派传统的文本的翻译，而后者实际上是从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出发，对这些文本进行的解读，而这一观点明显并不源自新左派。尽管科佩齐确实引用了原文，但《“新左派”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一部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限制的半学术著作。

在这本专著中，科佩齐对新左派利用和解读卢卡奇的方式进行再解读，而这再次凸显了这一专著的意识形态特质。科佩齐别无他法，只能强调新左派思想中的卢卡奇“线索”，并借此机会通过批判新左派文本对待卢卡奇的方式来对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进行解读。具有讽刺意味

① 其中一些学生后来成为后共产主义时代匈牙利媒体和传播领域的重要人物（参见2014年6月3日与塞克福的私人访谈）。

② Andras Szekfü, *A capa utolsó tangoja: mediaszociológiai tanulmányok a felkemeny diktaturában*. Budapest: Gondolat, 2008.

③ 七年后的今天（作者的文章发表于2016年——译者注），在匈牙利，仍然谈不上对恩岑斯伯格这篇极具原创性的重要文章及其与卢卡奇的论战有任何批评界、学术界、新闻界或公众的反应。但这种沉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既说明了这篇文章最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背景下撰写、翻译、审查并最终被禁止出版的，也说明了目前的政治、学术和媒体环境对这样一篇极富煽动性的文章选择了沉默。以上内容基于塞克福和达洛斯的回忆（发表于Szekfü, *A capa utolsó tangoja*），以及笔者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与塞克福的电子邮件交流和私人访谈。

④ 科佩齐（1921—2010）是匈牙利社会主义时期一位重要且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他是大学教授、文化和文学历史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前秘书长，也是政治家、教育部长以及审查制度的主要权威，曾任文化部部长。——作者注，译者有增改。

⑤ 在大多数情况下，科佩齐没有注明他所引用文本的译者，他有时甚至会引用整篇文章。恩岑斯伯格论文的匈牙利语译本也是如此：达洛斯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书中，尽管科佩齐对他的译文进行了大段引用。参见：Béla Köpeczi, *Az “uj baloldali” ideológiája*. Budapest: Kossuth, 1974, p. 137. 如果查看一下专著中提供的书目信息，就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重新构建原定选集的材料。科佩齐引用或提及了英语（包括英国和美国）、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资料来源。注释部分提及了这些学者的名字：贝蒂·里德（Betty Reid）、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查尔斯·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安德列·高兹（André Gorz）、威廉·怀特（W. Hollingsworth Whyte）、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鲍比·西尔（Bobby Seale）、克里斯托弗·赖希（Christopher Reich）、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爱德华·施瓦茨（Edward Schwartz）、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罗萨娜·罗珊达（Rossana Rossanda）、鲁尔·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居伊·德波（Guy Debord）、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康斯坦特·普雷沃斯特（Constant Prevos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汤姆·福思罗普（Tom Fawthrop）、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和瓦德克·罗歇（Waldeck Rochet）。

的是，此处出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卢卡奇：科佩齐认为，新左派为自己选择了错误的卢卡奇。对新左派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卢卡奇——换句话说，是苏联时期之前的卢卡奇。但这并不是新左派使用的唯一一本出版于 1923 年的书，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同样是重要的资料来源。^①科佩齐使用了三重方法来“修正”对这些文本的“错误”解释：他引用了更高的权威——列宁，还引用卢卡奇的自我批评（如 1967 年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序言），并且科佩齐还提供了自己对相关文本的解读和分析。^②

卢卡奇和柯尔施等 20 世纪 20 年代的“左翼共产主义者”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过于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化”，而对更为“客观的”环境和历史必然性（如阶级斗争、经济环境、党的领导作用等）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恩岑斯伯格和其他新左派传统的人来说，关键在于意识。新左派的一些支派希望通过人民意识的革命化来实现文化革命，但恩岑斯伯格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有趣的是，为了得出正确使用新大众媒体和大众传播设备的意义，恩岑斯伯格必须对卢卡奇展开批判，但 20 世纪 70 年代匈牙利对西方新左派思想的半官方解读却发现，恩岑斯伯格最大的错误之一仍然是“过分强调”意识在革命人民中的作用。这就如科佩齐声称的一样，前苏联化的卢卡奇（新左派推崇备至的那个卢卡奇）过于强调意识的作用。即使恩岑斯伯格对卢卡奇抱有批判的态度（对前者而言后者表露出了一种防御性技术恐惧症），科佩齐的当代解读揭示了早期卢卡奇与恩岑斯伯格之间的根本思想关联。

尽管《媒体理论的构成要素》的匈牙利语译本历史曲折，其获取途径也非常有限，但这份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新左派思想的宣言书在 70 至 80 年代的匈牙利还是得到了阅读和讨论。追溯这一非官方的接受故事将会是匈牙利知识和（社会主义）制度历史上的又一新系列的研究。显然，正是由于文章的翻译与地下出版物的传播，恩岑斯伯格对卢卡奇的看法在卢卡奇的祖国才得到了更多人的了解，而这些看法在定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非常重要。尽管《旧文化与新文化》是卢卡奇为数不多的几篇先以匈牙利语出版、后来才以德语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但为了使它在匈牙利更广为人知和更具影响力，它首先需要在一篇新左派德语媒体理论论文中受到严厉的，也许是不公正的批评。卢卡奇的文本通过翻译和再翻译，回归到了其字面和比喻意义上的“家”，并成为许多（有时是相互冲突、互相矛盾的）传统的一部分。

格奥尔格·图利系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高级研究员

檀健哲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廖伊凡）

① Béla Köpeczi, *Az "új baloldali" ideológiája*, Budapest: Kossuth, 1974, p. 84.

② Béla Köpeczi, *Az "új baloldali" ideológiája*, Budapest: Kossuth, 1974, p. 84. 书中引用列宁的内容来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讨论恩岑斯伯格的部分参见第 137—138 页，以及第 85—86 页、第 197—199 页中论卢卡奇的部分。